

·科学哲学·

## 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后现代走向

郭 贵 春      胡 瑞 娜

(山西大学哲学系,太原 030006)

**关键词:**真理符合论 经验适当性 语境化

**摘 要:**真理问题是哲学上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本文从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视角,揭示了范·弗拉森真理观在对传统真理观特别是科学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的反叛以及“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过程中,以“经验适当性”代替传统的真理概念,并且经历了由句法到语义,进而向语用的转变,最终达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基础上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解释学真理观,而这一过程又始终贯穿着怀疑论、概率论以及后现代整体论观念的渗透,从而实现了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后现代转向,同时也为真理观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视角。因此,具体分析范·弗拉森真理观的发展及其特征和趋向,对于把握整个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真理观,并站在这个层面去看待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具有深远的认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0)0010-08

站在世纪之交,理性地审视整个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自然地发现,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宣布“认识论的死亡”,并将几乎全部注意力转向方法论建构的同时,作为认识论范畴的真理问题,却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并被赋予全新的意义。一方面,发于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本世纪中叶开始的“解释学转向”的不可逆转性,使它改变了原有的存在形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论争,开始朝向语言的问题而生长;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使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烙印,具有较强的后现代特性。正是在这整个后现代哲学文化的背景中,范·弗拉森把“认识论的死亡仅仅看作是长生鸟再生之火”<sup>[1]</sup>,开始重解其真理观,并力图将它溶入这一大“语境”,从而实现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后现代“圆融”。因此,具体分析和研究范·弗拉森的真理观演变,对于把握整个后现代反实在论的真理观,并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看待整个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甚至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真理观研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

〔收稿日期〕1999年12月10月

〔作者简介〕郭贵春(1952- )男,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瑞娜(1974- )女,山西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 一、真理概念的合法替代

历史地讲,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对立贯穿于整个哲学史,而真理问题更是其争论不休且目前尚未解决的核心难题。因此,作为当代反实在论阵营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范·弗拉森必然要关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以便在与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为其自身的哲学开辟广阔的可能空间。

范·弗拉森始终把反对甚而否定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视为己任,同时也将这一任务看作是其构造经验论挽救经验主义命运的根本目的所在。他在详尽考察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演进之后,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口号的广泛渗透以及本世纪初整个科学哲学领域对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的全面介入,使得科学哲学家们理智地改变了对真理问题论证的策略,开始以语言为契机寻找对策,从而试图在语言范围内消解哲学难题。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按照他所下的定义,科学实在论主张“科学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的真实图画,而且科学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sup>[2]</sup>换句话说讲,“科学的目的是通过其理论给予我们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本义上真的描述;而接受某一科学理论就包含着相信它是真的信念”。([2],p.8)在这里,范·弗拉森之所以要加上“本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去排除这样一种实在论的学说,即只需“适当理解但本义却虚假或无意义的科学也为真”的主张。([2],p.9)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科学实在论与约定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工具主义也就没什么区别可言了。可见,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是符合论的真理观,它包含了“如果按本义诠释一个精确地描述了思想或符合于实在的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是本义上真的”。<sup>[4]</sup>但是,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东西,它除了给人一种美好的设想外,并不能从本义上对科学理论进行真正的解释。因为,在科学认识对象的可观察性和存在性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的关联。尽管他曾经郑重的宣布:“现在我必须报告我完全相信科学实在论的理由。这一思想转变是突然发生的,是在我阅读阿奎那的著作时无意地出现的。……我看到的是,中世纪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就具有证明科学实在论正确性的某种现代相似性”。([2],p.204)但是,从本质上讲,范·弗拉森对理论实体存在的承认,并不是为了走向实在论的真理观,而仅仅是一种反击实在论的策略要求。事实上,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模型和假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一种符合与对应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只有当理论拯救了现象时,理论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层面上获得意义。

另外,范·弗拉森强调对科学语言进行本义上的诠释也恰恰把他的构造经验论与逻辑实证主义及工具主义区别开来,从而使他的真理观具有了其自身独特的特征。这表现为,它不象其他反实在论那样从根本上否定真理性的存在,相反,它认同在可观察范围内理论能够拯救现象;而且,它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坚持对科学语言进行本义诠释,不仅排除了把理论当作一种“隐喻”或“明喻”的诠释,诸如工具论的说明;同时也排除了把理论从经验上归于某种不保留逻辑形式的转译后才是清晰的那种说明,如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两种语言的区分。

正是基于以上所作的“双向批判”,范·弗拉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其反实在论特征的真理概念以代替传统的真理概念,即“经验适当性”。他之所以以“经验适当性”代替传统的真理概念,是由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经验适当性”适应了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的现象,人们不能妄断不可观察对象

的存在性,而只能将其看作是为了描述某种测量对象的规律性而作出的假设。另一方面,当人们盲目于柏拉图式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最终导致怀疑论时,认识论的危机便由然而生,那种诉诸于永恒的,形而上学体系来为其服务的真理概念就不再能满足认识论上的需求了。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范·弗拉森提出了“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而只是经验的适当性”。<sup>[4]</sup>从而,不再需要为信念与对象的“符合”加以一致性阐释,也不必对保证进入这种符合关系的认知能力进行说明。它需要的仅仅是在特定相关理论的模型中找到诸观察对象的各自所在,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科学理论时,所隐含的只是对在经验上适当性的信仰,正如他本人所论述的那样,“接受一个理论并不是迫使我们去信仰任何一种东西的实在”。([2]p.197)或者说,“一切可能性的所在是模型,而不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实在”。([2],p.197)这样一来,经验适当性就取代了传统真理概念成为范·弗拉森构造经验论真理观的最基本的范畴,同时也满足了反实在论发展的新要求,合理有效地为其反实在论的真理观提供了坚实的基底。

其次,经验适当性又是在逻辑上独立于真理的科学成功的标准。以往的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们都把科学理论是否符合实在作为评价该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理论只有与实在相一致,或只有在实在中找到理论的对物,科学理论才是成功的。但是,在范·弗拉森看来,“在断定了科学语言必须做本义诠释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说没有必要相信好的理论必定是真的,也没有必要相信它们所假说的实体就是实在的。……科学旨在给予我们经验上适用的理论;而接受某一理论所包含的信念只是其经验上的适当性”。([2],pp.11-12)可见,范·弗拉森的真理观与科学实在论的分歧并不在于对科学语言的本义诠释以及对科学理论含义的理解上,而仅仅在于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因此,他得出结论:科学的“成功的标准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真理,而只是实际的和可观察的事实”。([4],p.193)在这里,范·弗拉森从理论的整体建构意义上,否认了理论模型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具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联,从而强化了经验适当性的合理有效性。换句话说,只有在经验的适当性上突破逻辑的约束或教条的真理观的约束,才能真正地拯救有意义的现象,从而使经验在创造性的意义上超越逻辑认识和对应认识的真理标准。

不言而喻,经验适当性的提出,标志着二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的解构,同时也喻示了真理观在语言哲学范围内后现代趋向上的又一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体现了经验主义认识论趋向的一种实现方式,但却并没有改变科学理性的本质。因为,在范·弗拉森那里,经验的界限仅仅在于,“经验给定的只是关于什么是可观察的和现实的信息”。([1],p.253)它没有,也不可能给出关于科学认识趋向的限制或约束。所以“像真理一样,经验的适当性并不具有绝对量上的程度,尽管它的特性是由大量相关的条件所制约着的”。<sup>[5]</sup>需要指出的是,范·弗拉森的真理概念具有折衷性,它吸取了科学实在论的合理方面,因而在与实在论的论争中占有了“主动权”;这恰恰与后现代大融合的趋势是不谋而合的。正是在这一真理概念的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范·弗拉森走向了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而这条通向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之路又蕴含了其反实在论真理观走向语用对话和“语境化”的解释学真理观的基本生长点。

## 二、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

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不仅仅是促进了语言分析方法的广泛渗透,更重要的是,它将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方法融为一体,并试图仅仅借助于对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就

达到对科学理论的本质说明。而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在科学认识论上将真理局限于语形分析,即单纯的词与词、语句与语句之间的关联层面,也就是采用人工语言进行语言分析来构造真理。但是,随着“解释学转向”的到来及其它对“语言学转向”的修正,人们发现,人工语言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合理的解释要求,它仅仅是一种用以理解或交流的手段或工具,也没有以语言共同体及其生活作为它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语言只有在交谈中,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才具有它真正存在的意义。语言在这里已不再是纯粹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人们通过它来拥有“世界”的生活过程。可见,语言走向“公共实践”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向。于是,自然语言便又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和对话方式重新取代了人工语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范·弗拉森提出了要“推进自然语言概念”,而恰恰在这个推进过程中,其反实在论的真理观也不可避免地获得了自然化重建,即走向了自然主义语言观的语义真理论。

### 1. 真理观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后现代发展趋向上的一股强大的洪流,也浸透了整个科学哲学领域,并获得了某种全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还将整个哲学与科学的、语言的、实践的、历史的自然化趋势关联起来,并以自然主义为轴心实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进而在自然主义的基底上,推动了科学哲学向后现代转变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范·弗拉森在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建构中引入了自然主义,突出强调了自然语言在科学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自然语言概念与任何逻辑框架之间的非对称性,从而实现了其真理观的自然化重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范·弗拉森将真理看作是语义范围内的概念,而这恰恰是他推进自然语言分析的结果。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他抛弃了那种将真理仅仅在句法层面上进行分析的做法,反对把真理局限于单纯的词与词、符号与符号、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形式化逻辑关联,消解了人工语言的唯一性,强化了自然语言的功能和地位,这就不仅为真理寻找到了语义学的分析基础,摆脱了纯逻辑的形式约束,同时也使语义分析从经典框架中转向了广义的可能世界语义分析的领域。因而,他明确指出:“真理概念和模型都属于语义学范畴”。([2],p.43)同时,在自然主义的基底上,他把科学活动看作是构造而非发现,从而暗示了真理存在的构造性。正是这种构造性彻底地抛弃了“第一哲学”的圣殿,揭示出“分析——综合”的区分在认识论上的无意义性,从而“没有比科学所提供或探索的真理更高的真理”。<sup>[6]</sup>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语言分析观的转向,使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真理观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趋势。

②将真理看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概念,只要求其在经验上是适当的,而不强求在不可观察范围的绝对性。在范·弗拉森看来,所谓“经验的适当性”就是指在可观察范围内,理论实体所指意义的有效性。但是,这不等同于把时空、基本粒子、场等等描述中的可能性看作是实在;相反,这种可能性只是经验适当性的描述,而不是理论与实在之间的绝对对应。因此,“经验适当性”作为真理概念的特定表述,是通过测量的经验性或可观察性被自然地表达出来,从而使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真理性直接当下地与测量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境遇相关联,最终将真理建构于自然主义的基底之上。

不言而喻,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真理观的自然主义走向不是偶然的,它是构造经验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变种,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极端逻辑理性形式的修正和矫枉,是对构造经验论的自然化重建。

### 2. 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论

范·弗拉森在推进其构造经验论真理观的自然化重建的过程中,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途径

无疑是其自然主义真理观得以全面展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同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包含了语义分析已替代逻辑句法分析而成为其构造经验论的主要方法论基底。另一方面,“后现代”语义学的语言观的确立,为其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建构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打破了传统语义学那种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的看法,从而试图在语义学的基础上,摧毁基础主义的哲学大厦,并为解构传统真理符合论奠定了可能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一点,范·弗拉森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其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从总体上讲,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由“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变为“非确定性”的“经验适当性”的真理概念,这就进一步为构造经验主义哲学奠定了解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基础。众所周知,奎因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当代自然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而范·弗拉森的自然化重建,无疑深受他的影响。在接受奎因自然主义的过程中,范·弗拉森同时也吸收了其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并以语义学为基底,将它容纳于自己的真理观建构中,这就具体地体现在“话语就象是一个坐标”的观点上([5],p.5)。如果我们用英语给出一个理论的话,那么,当我们把它翻译成德语时,就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会产生一个在意义上等同于英语却在字面上与英语不完全相同的德语描述。因此,“翻译就类似于坐标变化”。([5],p.5)正是基于上述这一生动的比喻,范·弗拉森认识到科学真理就是对现象或可观察对象的探索,因而是相对的、可错的和可修正的。于是,他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将“翻译的不确定性”映射到其真理观上,以揭示传统的那种象征着确定性、绝对性的真理观的缺陷,从而要求在本质上打碎预设真理的僵化框架,以便在这一框架内消除循环论证。在这里,真理的“非确定性”标示了自然主义的相对性特征,而这恰恰与“后现代”广义的可能世界语义分析的特征不谋而合。事实上,范·弗拉森真理观的“非确定性”既是其“经验适当性”的本质所在,也是一种具有较强特征的后现代反实在论态度。

②把真理观看作是一种“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为其真理概念走向公共实践和生活实践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其反实在论真理观走向语用对话提供了基础。在范·弗拉森看来,接受一个科学理论并不是相信这个理论为真,而仅仅是相信它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因此,相应地,真理观作为一个理论,也只是一种“经验上适当”的体系而非其它。而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将真理性看作是一种对测量直觉的因果性的“依赖”,而不是对经验证据或辨明的“依赖”,而且原先那些赋有意向和心理意义的信仰就不必乞灵于永远不可能完备的形式语言,更不必还原为某种更基本的东西。相反,它只需在成真的意义上,依赖于言说的外部环境,即依赖于人们充分的生活实践中所予以的价值取向和标准。显然,在这里,范·弗拉森的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促使人们更为宽泛地使用自然语言,并在自然语言的使用中显示真理的存在方式。

③范·弗拉森将完美的(complete)语义结构看作是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一种障碍,正是基于对这一障碍的消解,提供了其向“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转变的动力。在阐释与真理性密切相关的意义理论时,他明确地指出:“如果消解语言的完美的语义结构的话,那么,以模型为中介的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联就很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完整的关联”。([4],p.213)很明显,对于语言的阐释以及对真理的说明在这里已不是简单的实际概指与语法表述之间的联系;相反,这一阐释与说明需要有两个步骤:首先,特定的表述是一系列模型及其逻辑关联所给定的“值”,而这些模型及其逻辑关联又来源于这些“值”之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模型的特定部分可能与实在的某些要素相符合,因而我们能够间接地获得相关的指称或概指的意义,即对特定语言和真理性的阐释。可见,对模态话语的探索很大程度是利用了那些剥去了对实在描述的

模型结构,因此,那些未被剥离过的完美的语义结构就成了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障碍,而要寻求语言与实在、理论与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必然要超越单纯语义学分析,以消解这一难题,而这又恰恰预示了范·弗拉森从后现代反实在论的自然主义真理观走向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观的基本生长点和融合点。

不言而喻,范·弗拉森对自然主义的语义真理观的构建,超越了传统经验主义局限于概念与命题的意义范畴,获得了较大的表述空间,同时,他对真理走向公共实践问题的探讨,也突破了正统经验主义的现象主义藩篱,拓展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义观的基底上,拯救了现象同时又超越了现象,开辟了构造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自然主义作为宣判传统认识论已经“死亡”了的认识论纲领所具有的缺陷,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范·弗拉森不得不转换态度,最终走向了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的真理观。

### 三、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

伴随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汇流的波涛,继“解释学转向”之后的“修辞学转向”使得修辞学不可避免地被引入了科学哲学的广阔领域。它作为解释学的一种变形,进一步将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本文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把科学的构建、陈述和证明看作是“修辞学的转义”(rhetoric tropes),并将科学论述看作是境遇论述,要求在“语境”的基底上,以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去整合阐释真理问题的基础,从而强化了理论表述的实践的、历史的和整体的统一;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其“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sup>[7]</sup>而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 and 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sup>[8]</sup>因此,真理问题在后现代的大环境下,不仅要以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为基础,而且要把语境作为主体为了达到人类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作为基底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真理观实现了后现代的“圆融”,走向了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其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①适应了其哲学方法论的建构要求。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仅仅是我们文化整体的一种活动,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参与者与观察者”。([5], p.1)正是在这一文化整体的框架内,其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因此,在后现代状况下,当其哲学方法论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而最终走向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解释学方法以及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语言学方法的同时,其真理观也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进程,开始在语境基底上,建构其真理观。同时,由于后现代整体论观念的广泛渗透,使得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分析方法也开始相互渗透,构成了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真理观的语言分析基础。这样一来,其真理观就满足了其后现代方法论建构的要求,从而将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融为一个整体,形成系统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科学哲学思想。

②将语用学看作是逻辑分析的基础,为进一步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观,摧毁基础主义大厦提供了理论基石。传统认识论认为,逻辑分析、句法分析是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是以逻辑句法分析为起点的。但是,范·弗拉森一反传统常规,把这一逻辑关系作了颠倒。在他那里,“真值概念的可应用性是所有逻辑分析的基础”。([4], p.193)

换句话说,逻辑分析既是逻辑起点,又是超越自身之外的东西;同样,语言的使用既依赖于逻辑句法分析,同时又可以作为逻辑句法分析的前提。在这里,只有超越自身,才能最终超越他物,也才能拯救他物。正是基于这一与传统完全背离的认识,范·弗拉森明确地意识到,正是那些超越了现象相似性的适当性经验,才能使现象摆脱由纯句法描述和语形分析所导致的与经验的本质分离以及经验的自身断裂,从而实现由经验的适当性去拯救现象的目的。可见,没有超越也就没有拯救。而正是这种超越使得传统真理观在经验适当性面前显出了其不足与缺陷,于是,更加强化了范·弗拉森要强烈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决心。

③真理问题的语境化是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走向在其科学哲学中的具体化。后现代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科学主义以及反表征主义等等。而语境概念的提出,恰好就是上述这些特征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而且还融合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特征,并借鉴了解释学和修辞学的方法论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弗拉森把语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出强烈的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同时,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语境又作为一种具有经验适当性的概念突现出来,成为其构造经验论的一个经验基底和一种展示其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在范·弗拉森那里,语境不仅仅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一种为开放的科学文本进行解释所营造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其真理观也是开放的,它不要求主客观的一致,而仅仅要求在理论与实在之间构造一种关系,即经验上的一种适当性关系。于是,主体在这里被消解了,人们已不需再把注意力放在任何对象主体的单一层面,也不需要从主体出发去阐释意义,而只需从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联去彻底地消解主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性质。同时,这反过来又标示了这些关系背后所隐含的语境概念的后现代特征,因为语境的本质也正是各种关系的有边界的集合。也就是说,恰恰是语境的这一本质决定了真理是一种内在的关系。

④范·弗拉森的后现代反实在论真理观实现了其整个构造经验论的后现代“圆融”,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后现代趋向。作为后现代语境概念广泛渗透于整个哲学领域甚至整个文化领域的产物,范·弗拉森的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建构,无疑为其整个构造经验论实现后现代的圆融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作为“解释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结果,又势必为真理观进行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长期以来,代表了不同哲学主题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始终处于相互排斥的情结状态中,因此,如何在新的立场、新的基点上消解对抗,增进对话,便成为整个哲学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后现代语境概念和解释学方法的引入,为这一难题的消解提供了可能的途径,而范·弗拉森后现代反实在论真理观的建构则是促进这两大哲学传统相互渗透的“催化剂”,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寻求到新的突破点和关节点,在共同的发展当中逐渐地使其构造经验论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趋于一致,最终展示出其后现代反实在论哲学生长的历史的开放性、内在的一致性和发展的可能性。

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范·弗拉森所构建的反实在论的后现代语境化的语用解释学真理观,仅仅是真理研究中的一种趋向或态势,它并不具有任何特权地位。它仅仅意味着,在“语境化”的意义上,真理已不再是代表哲学旨趣的终极主题,从而为消解传统形而上学难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手段和途径。

## 四、结 语

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思潮粗暴地横扫整个文化领域,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湮没在语言中,将生命的价值消弭于话语的操作之中时,范·弗拉森却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手法,反对把哲学抛到语言的海洋中,将科学真理视作一种关系、功能、性质,而非纯粹的语句,避免了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恰恰是在这个基点上,他的反实在论真理观作为对语义真理观及整体论的继承和开拓,实现了在后现代境况下的圆融。总之,作为一种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真理论的样板,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应是不容置疑的。

### 〔参 考 文 献〕

- [1] Paul M. 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 Hooker, *Imag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247.
- [2]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 - 7.
- [3] Euis, B: *Truth and Objectivity*, Basil Blackwell, 1990, p. 94.
- [4] Bas c. Van Fraassen, *Laws and Sym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2.
- [5] Bas c. Van Fraassen, *Quantum Mechanics - An Empiricist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 12.
- [6] W·V·奎因:《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见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第 52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7]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 页。
- [8] 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C.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 p. 6.

〔责任编辑 胡新和〕

(上接第 9 页)

有人辩解说,设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是为了尊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贡献,若有政要混入,也只是有利有弊。然而,君不见,“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只要有一个政要混入,就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效果上就是不尊重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的行为。

本来,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学术专家就是学术专家,搞学术的与搞政治的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然而在中国,谁也担保不了不甘于自己的活动领域的官员们纷纷混迹于院士行列,客观上必然是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水平象征的中国院士制被搞得名声狼藉,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对我国的学术已有深刻成见的国际学术界将更加看不起中国的社会科学。

总之,对设社会科学院士制的倡议,我不仅深感忧虑,对这种动机也深感怀疑。但愿中国暂不要设社会科学的院士,但愿官员们不要再来玷污“院士”这一神圣的称号了!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醒民〕

〔编者附识〕为将笔谭广泛深入地进行下去,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将截稿日期延至 2001 年 3 月 1 日,希望各地学人和学子不吝赐稿,参与讨论。